

关于六朝建康气候、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

郭黎安

(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京 210013)

内容提要 本文从爬梳、排比史料出发,对六朝建康的气候、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作了初步研究。气候方面,认为六朝时期建康的气候不但较现代寒冷,而且连续干旱、阴雨和下雹等气候异常的年份也较多。自然灾害方面,对人类社会危害较大的主要有旱灾、水灾、火灾和疾疫。文中阐述了各种灾害发生的原因、时间及其后果。生态方面,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,可知其时建康水面广阔、植被茂密、动物繁多,生态环境十分优越。

关键词 六朝建康 气候 自然灾害 生态环境

中图分类号: K 295.53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1—8263(2000)08—0025—07

气候、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,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。但在唐代以前,由于我国官修地方志的制度尚未形成,关于这些方面的一时一地的资料保存甚少,从而给个案研究带来困难。本文从爬梳史料出发,对六朝时期建康的气候、生态和自然灾害作一初步研究,以期抛砖引玉,求教于方家学者。

气候

由于历史记载匮乏,使得研究六朝时期建康的气候十分困难。就笔者寓目而言,竺可桢先生在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一文中关于南朝气候的描述,迄今仍是海内唯一对六朝建康气候的研究。其文云:

“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个有气候意义的有趣之事。冰房是周代以来各王朝备有的建筑,用以保存食物新鲜使其不致腐烂之用的。南朝以前,国都位于华北黄河流域,冬季建立冰房以储冰是不成问题的,但南朝都城在建业(今南京),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装起冰来,情形就不同了。问题是冰从何处来?当时黄淮以北是敌人地区,不可能供给冰块;人工造冰的方法,当时还不可能;如果南京冬季温度像今天一样,南京附近的河湖结冰时间就不会长,冰块不会够厚,不能储藏。在1906—1961年期间,南京正月份平均温度为 $+2.3^{\circ}\text{C}$,只有1930、1933和1955年三年降低到 0°C 以下。因此,如果南朝时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个事实,那么南京在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到大约摄氏

2℃, 平均年温 1℃。”

上述史料见《宋书·礼志》:“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, 诏立凌室藏冰。有司奏, 季冬之月, 冰壮之时, 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于深山穷谷洄阴沍寒之处, 以纳于凌阴。务令周密, 无泄其气。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于凌室之北。仲春之月, 春分之日, 以黑羔秬黍祭司寒。启冰室, 先荐寝庙。二庙夏祠用鉴盛冰, 室一鉴, 以御温气蝇蚋。三御殿及太官膳羞, 并以鉴供冰。自春分至立秋, 有臣妾丧, 诏赠秘器。立夏至立秋, 不限称数以周丧事。缮制夷盘, 随冰借(供)给。凌室在乐游苑内, 置长一人, 保举吏二人”。《南史·宋孝武帝纪》:“大明六年五月丙戌, ‘置凌室于覆舟山, 修藏冰之礼。’”《建康实录》卷 12 所引《舆地志》:“其山(笔者按: 指覆舟山)北临湖水, 后改曰乐游苑。山上大设亭观, 山北有冰井, 孝武藏冰之所。”同书卷 13:“大明六年夏四月, ‘丙戌, 初置阴室于覆舟山, 修藏冰之礼。’”《宋书》和《舆地志》的作者沈约和顾野王皆梁陈时人, 上距刘宋不远, 故其记载应是可信的。《宋书·礼志》云, 凌室藏冰取自深山穷谷。然建康附近并无深山穷谷, 冰凌又不宜长途运输, 覆舟山北临玄武湖, 凌室建于此山之北, 恐即考虑到取冰之便, 所以南朝的藏冰很可能就取自玄武湖。

其次, 竺文还提到黄初六年(225 年)冬十月, 魏文帝“行幸广陵故城, 临江观兵, 戍卒十余万, 旌旗数百里, 是岁大寒, 水道冰, 舟不得入江, 乃引还。”^[1] 魏文帝至广陵(今扬州)临江观兵, 必由中渚水(今里运河)出长江, 所谓“水道冰”, 当指中渚水。广陵与建康相近, 两地气候相仿, 广陵城下的中渚水封冻, 也可证明建康冬季之寒冷。

除以上史料外, 笔者根据晋、宋、南齐、隋四书《五行志》和《建康实录》的记载, 注意到东吴至东晋时, 建康降霜最早的年份是吴嘉禾三年(234 年), “九月朔, 陨霜杀谷”。最晚

是东晋永和十一年(355 年), “四月壬申朔, 霜。”东吴至南齐降雪最早的年份是东晋太元二十一年(396 年), “冬十月, 大雪”。最晚是东晋义熙五年(409 年), “三月己亥, 雪深数寸。”^[2] 而如今南京的霜期约在公历十二月上旬至来年三月上旬, 要比六朝时短。降雪在近二十年间则已少见。

关于霜雪的大小, 上书也有简略描述。如东吴赤乌四年(241 年)正月, “大雪平地深三尺, 乌兽死者大半。”西晋元康五年(295 年)十二月, “丹阳建邺大雪”。东晋太宁元年(323 年)三月丙戌, “陨霜杀草”。太元二十一年(396 年)十二月, “雨雪二十三日”。元兴二年(403 年)十二月, “酷寒过甚”。刘宋元嘉二十五年(448 年)“积雪冰寒”。大明元年(457 年)十二月庚寅, “大雪平地二尺余”。梁天监三年(504 年)三月和六年(507 年)三月, 均“陨霜杀草”等等。诚然, 《五行志》是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记下了这些异常的天气现象, 故而比较特殊, 且有夸张之嫌。如在江南地区积雪三尺以及农历七八月下霜,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综合这些史料, 还是可以得出六朝时期建康的冬季较现代长, 气候较现代寒冷的结论。根据中外地理学者对我国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气候变迁的研究, 也都认为三到六世纪是处于冷期, 亚热带植物的北界较之今日要南移一个多纬度。^[3]

然而, 有一项史料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, 即关于建康桔的栽培。《建康实录》卷 9 引《苑城记》: 东晋太元三年(378 年)作新宫, “城外塹内并种桔树”。《宋书·符瑞志》: “大明元年二月壬寅, 华林园双桔连理”。《南史·齐高帝诸子传》谓豫章王萧嶷在建康的邸宅后园中有桔树。《隋书·五行志》亦云: “陈后主时, 梦黄衣人围城, 后主恶之, 绕城桔树, 尽伐去之”。可见当时桔树在建康的种植很普遍。以桔、梅、竹三种亚热带植物为例, 如今梅和竹在南京仍有生长, 而桔树只能生长

在太湖沿岸的苏州一带。即使在唐至宋初的暖期,柑桔生长的北界也不到今南京地区。^[4]柑桔的生长温度最低不超过 -8°C 。1955年1月上旬在特大寒潮袭击下,南京的最低气温达 -14°C 。太湖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的柑桔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冻害。^[5]按前所说,六朝是我国历史上的冷期,那么柑桔何以能在建康生长?此外,文献还记载了三国初曹魏在邺城(今河北临漳)铜雀园中种有朱桔,既不开花也不结实。^[6]未知建康的桔树也是如此?抑或已变桔变枳?

六朝时期,建康还出现过不少气候异常的年份。依现存史料,^[7]可以初步分析的为干旱、阴雨和冰雹。据不完全统计,自东吴五凤二年(255年)至陈太建十二年(580年),建康共发生干旱56次。以东晋立国后的二十年间旱情最甚。从太宁三年到咸康三年(325—337年),除了咸和三年(328年)、四年(329年)和七年(332年)外,连续干旱几达十年。又隆安四年至元兴三年(400—404年)、义熙八年至十年(412—414年)、宋大明七、八两年(463、464年)也都发生过连续干旱。在以上年份中,旱情最严重的为东晋永昌元年(322年),继夏天大旱后十一月又旱,致使京邑川谷并竭。咸和五年(330年)的春旱则造成当年麦禾无收,天下大饥。咸康三年(335年)又天下普旱,米价涨至每斗五百。元兴元年(402年)和义熙十年(414年)都是秋旱连着冬旱,并渎泉水大都枯竭。宋大明七、八两年(463、464年),三吴地区因旱灾,“民饥死者十六七”。孝武帝不得不多次下诏赈灾,并免除长途贩鬻米粟者的杂税。其时京师建康、秣陵二县也都开仓随宜贍恤。梁天监元年(502年)又因大旱,“米斗五千,人多饿死”。

关于连续阴雨的记载,自东吴永安四年(261年)至陈太建十二年(580年)为16次。其中,东晋永昌元年(322年),“春雨四十余日”。咸和四年(329年),“春雨五十余日”。

宋元嘉二十一年(444年)六月又“连雨百余日”。南齐时甚至有三次连续阴雨长达数月。即建元三年(481年)十一月,“雨雪,或阴或晦,八十余日”;永明十一年(493年)从四月一日起下雨,直到七月乃止;永泰元年(498年)十二月二十九日下雨至翌年五月二十一日方晴。从气象史的角度分析,连续不断地降雨数月的可能性甚微,这期间也间或有晴日。史亦称“昼或见日,夜乍见月”。^[8]但大多数当是阴雨天气。

六朝时建康下雹的年份也较多。自东吴嘉禾四年(235年)至陈太建十三年(581年),有雨雹的记载为27年。下雹的时间集中在三、四、五月,尤以四月最多。较严重的有西晋元康五年(295年)十二月,雨雹之后又接连大雪。东晋太宁二年(324年)四月庚子,“京都大雨雹,燕雀死”。宋元嘉九年(432年)春天,下雹的地域很广,京都以外,溧阳、盱眙受灾最重,“伤牛马,杀禽兽”。异常的气候使农业欠收、米价上扬、疾疫流行,给建康及其周围地区的民生造成极大困难。

自然灾害

洪水是建康的一大自然灾害,发生的频率很高。自吴太元元年(251年)至陈祯明三年(589年),正史《五行志》记录了京都及京都所在的扬州、丹阳郡共发大水50余次,平均不到七年就有一次。由于《隋志》的记载过于疏略,录梁陈时的水灾次数很少,故大都集中在东晋和刘宋。就东晋而言,以下列四个阶段水灾的发生率最高:一、太兴至咸和间(317—334年),十七年内有七次。二、永和四年至七年(348—351年),连年大水。三、隆安五年至义熙四年(401—408年),除元兴二、三两年(402、403年)外,也是连年大水。四、义熙八年至十一年(412—415年),又是连年大水。大水大都发生在五、六月份,共计有30次。其次是十二月份,有5次。这是因为农

历五六月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,降水量偏多。如东晋太和六年(371年)六月,太湖流域的晋陵(今常州)、吴郡(今苏州)、吴兴(今湖州)、临海(今浙江临海东南章安)四郡及其毗邻的丹阳郡(今南京)都遭到严重水灾,“稻稼荡没,黎庶饥馑”。其时,“京师大水,平地数尺,浸没太庙,朱雀航缆断,三艘流入大海。”^[9]宋元嘉十二年(435年)六月,“丹阳、淮南、吴、吴兴、义兴五郡大水,京邑乘船。”^[10]此外,发生于东晋太兴三年(320年)六月、咸和四年(329年)七月、宋元嘉二十一年(444年)六月、齐永明八年(490年)夏秋之交和梁天监七年(508年)五月的建康大水也都是由于淫雨绵绵,连月不开的异常气候所造成的。^[11]

建康的特大水灾还来自涛变。所谓涛变即指江涛倒灌引发洪水。史书记载建康的涛变共有13次。^[12]由于涛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洪水汹涌澎湃,滚滚而来,船舫民居猝然被淹,所以最具破坏力。如东吴太元元年(251年)八月朔,因大风引发海潮,江海涌溢,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一带均受到影响。建业平地水深八尺;曲阿(今丹阳)孙坚陵两千株树被毁,石碑碰动;吴郡城门瓦片飞落。又宋升明二年(478年)七月丙午朔,“涛水入石头,居民皆漂没”。^[13]这两次水灾都发生在农历七八月份的朔日,正是大潮汛和台风季节,故水势尤猛。涛变最烈的一次是东晋元兴三年(404年)二月庚寅夜,“涛水入石头,商旅方舟万计,漂败流断,骸骨相望。”史言“江左虽频有涛变,未有若斯之甚。”^[14]其余较大的涛变尚有东晋永和七年(351年)七月甲辰夜,“涛水入石头,死者数百人”。太元十三年(388年)十二月,“涛水入石头,毁大航,杀人。”十七年(392年)六月甲寅,“涛水入石头,毁大航,漂船舫,有死者。”齐永元元年(499年)七月丁亥,“涛入石头,漂杀缘淮居民”。梁天监六年(507年)八月,“建康大水,涛上御道七尺。”

陈祯明二年(588年)六月丁巳,“大风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,淮渚暴溢,漂没舟乘”^[15]等等。由上可见涛变的危害极大,给建康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。

所谓“涛水入石头”,不仅指江涛涌入长江边的石头城(今南京清凉山),而且是倒灌入淮(今秦淮河),以故,沿淮居民和位于城南地势低洼处的御道、太庙首当其冲,受害最深。为了防止洪水侵袭,东吴起便在淮水两岸筑堤立栅,以后各代都有修筑。规模最大的一次为梁天监九年(510年),“新作缘淮塘,北岸起石头迄东冶,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”。^[16]但因当时的塘坝还较原始简陋,不足以抵挡洪水的肆虐,所以缘淮塘筑后,每遇大水,御道依旧可以通船。

火灾是建康的又一大自然灾害。主要发生在宫廷、官署和居民密集区。东晋南朝时,建康宫曾多次遭受火灾。东晋太元十三年(388年)十二月,先是延贤堂起火,过了数日,螽斯则百堂又起火。齐永元元年(499年)八月,宫中大火,火势北至华林园墙,西及秘阁,焚烧屋宇达三千余间。皇后居住的昭阳、显阳二殿及西斋璿仪殿等皆毁于这次大火。永元三年(501年)二月,乾和殿西厢失火,烧毁房舍三十间,东昏侯只得迁居东斋。梁普通二年(521年)五月,琬璿殿失火,也延烧后宫三千间。史言太元时,晋孝武帝沉湎于酒色,与宰相司马道子以酣歌为务,常作长夜之饮。道子“宠幸尼及娼母,各树用其亲戚,及至出入宫掖,礼见人主”。^[17]南齐东昏侯更是一位荒淫无耻的昏君,嬉戏无度,经常昼眠夜出。故而推测以上火灾恐均由宫禁不严、出入人员芜杂和灯火管制不当所致。

六朝时,建康人烟稠密,民居又都是砖木结构和草房。^[18]因此也很容易引发火灾。且一旦着火,牵连面广,受灾居民动辄达数千上万户。东吴建衡二年(270年)三月,京师大火,“烧万余家,死百人”。^[19]东晋义熙九年

(413年)，“京都大火，烧数千家”。^[20]宋元徽三年(475年)三月，大火又烧毁了淮水两岸的民居数千家。居民区的火灾多发于二三月，其时，春风骀荡，气候较干，火势因风蔓延，灾情尤为严重。史称东晋宁康元年(373年)三月，“京师风火大起”；^[21]宋元嘉二十九年(452年)三月壬午，“京邑大火，风雷甚壮”；^[22]皆属此类。

雷震也是建康火灾的原因之一。古代，我国的民居都较矮小，因而雷电往往击中城门、宫殿、寺刹、华表等高大建筑物。如东晋太元十四年(389年)七月甲寅，都城宣阳门四柱因雷击起火。齐永明四年(486年)五月五日，雷击乐游苑安昌殿，引发火灾。尤其是梁中大同元年，雷火将著名的同泰寺的禅房、浮屠焚烧殆尽，仅余下柏殿和瑞仪殿，^[23]直至陈末都无法恢复。

南朝时期，建康政局动荡，皇室内讧和外臣叛乱迭起。战乱中，为了制服对方，常用火攻，建康的特大火灾均由此而起。齐永元元年(499年)八月，东昏侯即位不久，宗室萧遥光据东府城谋反。齐军先以火箭射烧城东北角楼，破城之后，又极力焚烧，使有着一百余年历史的东府城毁于一旦。最大一次火灾发生于梁末侯景之乱。太清三年(549年)，建康陷落，侯景先将淮水南岸的民居营寺全部烧尽，辟为战场。接着，在攻占宫城的过程中，景军“以火车焚城东南隅大楼”。^[24]简文帝则遣官军在城上纵火，焚烧叛军的攻城器械。侯景败退后，王僧辩来到建康，其部下又烧毁了太极殿、东西堂及其他宫室。偌大一座建康宫只剩废墟，繁华的六朝都城也从此由盛转衰。

疾疫是对人类社会有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之一，在医药不昌明的古代尤其如此。建康的疾疫以春夏之交的农历四五月间最为多发，计有8次，秋冬之交和冬季次之，计有4次。分别占史载总疫次的40%和21%。盖

因其时或天气变化无常，或乍暖还寒，人们的肌体不易适应外界的气候变化，故易发疾病。除此之外，旱涝灾害更是诱发大疫的主要因素。如东晋太兴三、四两年(320、321年)连续水灾，永昌元年(322年)即发生大疫。太元三年(378年)六月的大水导致夏秋不熟，翌年三月青黄不接之时便大疫流行。又咸和五年(330年)春天干旱，麦禾全部枯萎，天下大饥，史称是年五月“旱，且饥疾”。^[25]宋元嘉四年(427年)京都大疫，文帝曾为此下疾疫求言诏，诏曰：“顷阴阳违序，旱疫成患”。^[26]大明四年(460年)四月，孝武帝诏：“都邑节气未调，疫疠犹众，言念民瘼，情有矜伤，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，其死亡都随宜恤贍”。^[27]梁太清元年至二年(547—548年)，“旱疫二年，扬、徐、兖、豫尤甚”^[28]等等，都说明疾疫的发生与旱涝灾害密切相关。因为大灾之后环境污染、病菌滋生、粮食奇缺，人们的体质和免疫力明显下降，此时传染病最易流播，故常导致时疫发生。

战争也是时疫流行的诱因。最明显的莫过于东吴建衡间，诸葛恪连年征战，发州郡兵二十万围攻曹魏合肥新城。时值盛暑，因连月不克，军人已十分疲惫，再由饮水不洁而致腹泻。“病者大半，死伤涂地，诸吏曰白病者多”。回师途中，“士卒伤病，流曳道路，或顿仆坑壑，或见略获，存亡忿痛，大小呼嗟”。^[29]惨象不忍目睹。

分析建康的疾疫，其特点首先是流行期长。如东吴凤凰元年至三年(272—274年)皆有疫情，《三国志》称“自改年及是年，连大疫”。东晋太元四年(379年)冬发生疾疫，直延至次年夏季。梁太清元年、二年(547、548年)也是连续两年大疫。其次是疫情重。《晋书·元帝纪》云，永昌元年(322年)十一月，以司徒荀组为太尉，己酉，未拜而薨。闰月己丑，元帝又崩。其时正是时疫流行期。同书云：“冬十月(《宋书·五行志》作十一月)大疫，

死者十二三。”可见在这次时疫中丧生的人很多。疑元帝和荀组也极有可能死于此。而太元五年(380年)五月的大疫更使众多百姓人亡室空,合家覆灭,所谓“多绝户者”。永和末年,甚至因疾造成百官不入朝的局面。以致吏部尚书王彪之不得不上表:“疾疫之年,家无不染,若以之不复入宫,则直待顿阙,王者宫省空矣”。^[30]疫情之重,跃然纸上。宋元嘉二十四年(447年)六月,也因“京邑疫病”,文帝专门下诏:“使郡县及营署部司,普加履行,给以医药”。^[31]复次是疫区广。如西晋泰始十年(274年)那次疾疫,《宋书·五行志》记为“大疫,吴土同”。同书又记东晋永昌元年(322年)十一月,“大疫,死者十二三,河朔亦同。”按《五行志》行文惯例,凡不注明地点的事件均以首都为准。西晋都洛阳,故言“吴土同”。而河朔不在东晋辖境内,故又特记之。足见这是两次播及南北的大疫。

生态环境

六朝时期,建康的生态环境十分优越。水面和树木在城市面积中占很大比例。其时,自然河湖有淮水、金川河、玄武湖、燕雀湖和青溪。淮水宽达九十步,水量远较今日丰沛,而且尚未像以后那样因漂丝和倒置生活垃圾而受到污染,故水质纯清。金川河原是地质时期古淮水的支流,位于建康城西北,入江口在今狮子山下。直到明代它仍是南京地区的一条大河,担负着漕运六合、仪征货物的任务。玄武湖据地貌分析,可西达今西流湾、东抵钟山山麓,并由金川河沟通长江。青溪发源于钟山,汇集山南之水形成燕雀湖后南流入淮。北宋初年尚阔五丈,深八尺。人工开凿的河渠有潮沟和运渎,二渠皆以玄武湖为水源。

此外,在遍布京师的公私园林中也有不少水面。皇家华林园有天渊池,宋少帝又在园中开渎聚土,以象破冈渎。东晋明帝为太

子筑园,号称西池,说明园乃以水面为主。南朝东宫玄圃园“多聚奇石,妙极山水”,^[32]梁昭明太子常与左右泛舟其中。私人的宅园建设更是少不了湖塘水池。时人有“十亩之宅,山池居半”^[33]之说。史言东晋司马道子营东第,“筑山穿池,列树竹木”,道子“使宫人为酒肆,沽卖于水侧,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,以为笑乐”。^[34]宋世刘勔宅于钟山之南,“聚石蓄水,仿佛丘中”。^[35]阮佃夫的“宅舍园池,诸王邸第莫及”,甚至“于宅内开渎,东出十许里,塘岸整洁,泛轻舟,奏女乐”。^[36]至于沈庆之的娄湖园,更直以娄湖为名。其余凡史书提到的王邸私宅,都莫不有池沼湖面。检正史《五行志》,六朝时建康有严寒而无酷暑的记载,说明当时夏天的气温较现代要低,无今之炎热。固然三至六世纪时我国正处于冷期,然也不可忽略广阔的水面对建康小气候的调节作用。

六朝时,建康城内外树木成林,十分茂盛。《江表传》云,吴宝鼎二年(267年)孙皓为筑昭明宫,曾遣“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。”《丹阳记》云:“(钟)山本少林木,东晋时使诸州刺史罢职还者栽松三十株,下至郡守各有差”。位于城东北的摄山,即以“山多药草,可以摄生”^[37]得名。以上都说明建康四周的山岭上林密草茂,植被覆盖良好。至于城内,东吴时便于宫后建造了庞大的苑囿,又于御道两侧开水沟,植槐柳。左思誉为“树以青槐,亘以绿水,玄荫耽耽,清流亹亹”。^[38]东晋太元三年(378年)扩建建康宫,也于“城外堑内并种桔树,其宫墙内则种石榴。其殿庭及三台、三省悉列种槐树,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,悉种垂杨与槐也。”^[39]据《宋书·符瑞志》记载,建康的树种有桐、榆、枫、槐、杨、竹、松、柏、榉;果木有桃、李、梨、梅、桔、枣、林檎。宫内西堂、尚书都坐、螽斯堂周围均栽桃、李、梨树。璿明殿外有槐树,徽音殿前有果树,合欢殿后有香花诸草。华林园中有梨、桐、桔

树。乐游苑有梅树,芳林园有桐树等等。王邸、官署和士庶百姓的宅园中也都遍栽果树佳木。史载吴时工人黄狗家有枣树。^[40]刘宋时秣陵县衙前有竹林。^[41]而梁沈约和徐勉园中“风骚屑于园树。月笼连于池竹”;“桃李茂密,桐竹成荫”^[42]的秀丽景色则可代表六朝高门权贵宅园的普遍风貌。此外,建康城外散布着许多六朝各代的王陵和墓园,按照我国的风俗习惯,其中也栽种着大量的松、柏、杨、榉等树木。

茂密的植被、纯净的水质引来了各种动物。《宋书·符瑞志》云,元嘉二十五年(448年)玄武湖中出现黑龙;孝建二年(455年)又在石头城外水滨出现黄龙。或以为所谓的“黑龙”和“黄龙”有可能是扬子鳄。而在江乘县境(今南京市东北栖霞山一带)则有老虎出没,并多次发现白鹿。秣陵县也曾捕获过青麋。其时,天子每年春天要在京郊举行射雉礼,畋猎活动亦较频繁,建康周围野生动物之多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与此同时,各种鸟类也频频光顾建康。野雉、苍黑色大鸟、鸛、喜鹊等常在宫廷宅园内飞翔。尤其是喜鹊和燕子,数量极多,在宫殿、城门和民居内到处筑巢。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咸康八年(342年)七月,“有白鹭集殿屋”;宋元嘉二年(425年)春,“有江鸥鸟数百集太极殿前小阶内”。^[42]白鹭有生态环境监测鸟之称。白鹭、江鸥集结宫内,充分反映了建康生态环境之优越。

注:

[1]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。

[2]因《南齐书》、《隋书》记载疏漏,故无法全面统计。

[3]龚高法等《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》;王开发等《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、气候变化》,分别载《历史地理》5、6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、1988年9月出版。

[4]满志敏《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原理》,载《历史地理》12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。

[5]《江苏地理》第37页,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。

[6]竺可桢文引唐李德裕《瑞桔赋序》。

[7]现存史料指正史《帝纪》和《五行志》,以下不一一注出。

[8]《南齐书·五行志》。

[9][14][20][21]《晋书·五行志》。

[10][13][22][42]《宋书·五行志》。

[11]据有关《五行志》所载大水与恒雨的比较。

[12]据有关《五行志》统计。

[15]《陈书·后主纪》。

[16]《梁书·武帝纪》。

[17]《晋书·司马道子传》、《晋书·五行志》。

[18]《宋书·后妃传》:明帝陈贵妃家有草屋在御道边,后明帝赐钱令起瓦屋。

[19][39]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皓传》。

[23]关于同泰寺火灾年代,《建康实录》云“大同中”;《建康志》云“大同元年”;今据《梁书·武帝纪》:中大同元年四月丙戌,武帝尚于该寺解讲,设法会,是夜,“同泰寺灾”。

[24]《南史·侯景传》。

[25]《晋书·成帝纪》。

[26][35]《宋书·文帝纪》。

[27]《宋书·孝武帝纪》。

[28]《隋书·五行志》。

[29]《三国志·吴书·诸葛恪传》。

[30]《晋书·王彪之传》。

[31]《南齐书·文惠太子传》。

[32]《梁书·庾诜传》。

[33]《晋书·司马道子传》。

[34]《宋书·刘劭传》。

[35]《宋书·阮佃夫传》。

[36]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0。

[37]左思《吴都赋》。

[38]《建康实录》卷9引《苑城记》。

[40]《宋书·符瑞志》。

[41]《梁书·沈约传、徐勉传》。

〔责任编辑:兆 录〕